

第6辑

文学与文化

南开大学文学院《文学与文化》编委会 编

WENXUE YU WENHUA

南开大学出版社

文学与文化

第6辑

南开大学文学院《文学与文化》编委会 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与文化. 第6辑 / 南开大学文学院《文学与文化》
编委会编.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5. 12
ISBN 7-310-02485-0

I. 文... II. 南... III. 文史哲—中国—丛刊
IV. C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8004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肖占鹏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23502200

*

河北昌黎太阳红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21.125 印张 4 插页 310 千字

定价: 41.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23507125

目 录

【士人心态与文化性格】

- 1 鲁迅与陈西滢:令人遗憾的笔墨官司 李新宇
- 12 以“传统”批判“时代”
——“谴责小说”作家群的文化性格考察 耿传明
- 24 多变命运·双重人格·二元互补心态
——宋代士人心态与社会背景的分析 刘 畅

【文学、思想与社会文化】

- 37 王国维文学研究的美学方法 张 毅
- 50 嵇康《声无哀乐论》若干问题探讨 卢盛江
- 60 先秦两汉人物品藻活动的内涵嬗变 宁稼雨
- 69 卜辞贞问对象及其政治含义管见 沈立岩
- 79 《老子》“受垢守辱”思想及相关文本的讨论 李道和
- 89 民间立场:日常口语化的解构写作 罗振亚
- 99 一个刊物与一场诗歌运动
——论朦胧诗潮中的民刊《今天》 李润霞
- 110 危机、文学性与比较文学的前景 徐 清
- 124 罗兰·巴特超文本思想论略 李玉平
- 134 人性的吁求与理性的规约
——“五四”的人学思想及人本主义道德观 朱献贞
- 143 被迫的接受、抵制与消解
——关于国民性的多重实践 孙 强
- 151 小议现代文学的“自我” 许剑铭
- 160 文学指涉性研究述评 步朝霞

【写作与批评】

169 小敷山下梦 才人怨春风

——由《沈下贤集》观沈亚之的文学创作风貌

..... 萧占鹏 李勃洋

178 论胡应麟的小说史观

孟昭连

190 论《金瓶梅》中所谓的叙事功能

陶慕宁

203 骑士文化与《亚瑟王之死》

王立新

214 《罗密欧与朱丽叶》之解构

王 力

226 论庄子行文的章法与字法

——以《齐物论》的文法为例

赵 燕

236 《三国演义》毛评中的互文批评举隅

——以景物描写的评点为例

刘海燕

247 梭罗与斯多葛主义

韩德星

【文学与性别】

258 新时期女性文学与现代国家意识

乔以钢

267 家庭:在不同的性别视角下

——《金锁记》与《红楼梦》之比较

陈千里

【文学与宗教】

277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批评的复调

王志耕

287 说“无常”

王 辉

299 照镜称王与照水称王

——《聊斋志异》造反起事神秘描写的宗教渊源

刘卫英

【文学文献】

309 今本《搜神记》及《后记》所存在的问题

李剑国

319 尹蕴清《东海遗闻》考论

张振国

329 时事小说考

任增霞

鲁迅与陈西滢：令人遗憾的笔墨官司

李新宇

1925年，面对愈演愈烈的女师大风潮，鲁迅与陈西滢表现了绝然不同的看法和态度。二人因此发生了持续的论争，最后终于弄到矛盾无法化解的地步，从此构怨，直到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件众所周知的公案。在纷争不断的文坛上，文人相轻，相碰相撞，这几乎算不上什么事。在论敌甚多的鲁迅身上，这也只是众多论战中的一个并不精彩的回合。然而，当我们透过历史的长河作相互联系的观察时，却很容易发现，一件小事也会发生一系列影响，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鲁迅与陈西滢的论争实在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不该发生的一大憾事。它对鲁迅本人的人生轨迹和整个新文化事业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

事情的起因并不复杂。1924年底，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因为开除学生而引发学潮，成为不被学生承认的校长。次年5月，杨氏试图借“五七”国耻纪念日的机会，以校长的身份主持演讲会。结果，在杨荫榆领着几位演讲者走进会场时，许广平、刘和珍等学生会成员坚决不许她上主席台，而且要求她退出会场。长时间的僵持导致会场秩序大乱，最后杨荫榆只得妥协退出了会场。如果放在民主意识较强的人身上，校长当到这种地步，也许早就辞职了。但杨荫榆面对一片反对之声，她想的不是自己如何引咎辞职，而是以更强有力的手段维护校长的权威。5月9日，学校贴出了开除许广平等六名学生的布告。然而，学生会再次做出决定：学校开除许广平等六名学生的布告无效。于是，学生与校长的冲突又掀新的波澜。

在女师大学生与校长的冲突中,鲁迅站在了学生一边,并且执笔代学生呈文教育部,要求撤换校长。同时,执笔代表七位教授写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在学生需要教师支持的时候,鲁迅站出来了,这无疑显示着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一代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光彩。然而,面对同一个事件,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也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并因此采取不同的态度。就在鲁迅等人的宣言发表后,1925年5月30日,陈西滢在《闲话》中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说:“以前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对的,现在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错的。这可以说是今昔言论界的一种信条。在我这种喜欢怀疑的人看来,这两种观念都无非是迷信。女师大的风潮,究竟学生是对的还是错的,反对校长的是少数还是多数,我们没有调查详细的事实,无从知道。我们只觉得这次闹得太不像样了。”他认为:“教育当局应当切实的调查这次风潮的内容,如果过在校长,自应立即更换,如果过在学生,也少不得加以相当的惩罚,万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以至将来要整顿也没有了办法。”单看这几句,他是很公允的。然而,其中一段话涉及鲁迅:“闲话正要付印的时候,我们在报纸上看见女师大七教员的宣言。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励,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这个宣言语气措辞,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公允……这是很可惜的。我们自然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但是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①显然,陈西滢认为鲁迅等人过于偏袒学生,而且暗示鲁迅“挑剔风潮”,但态度相当温和,言辞也不激烈。

面对陈西滢的文章,鲁迅当天(5月30日)就写下了《并非闲话》一文,发表于6月1日《京报副刊》,6月2日又写下了《我的“籍”和“系”》。鲁迅的文章有辩白也有反击。辩白主要是不承认自己“挑剔风潮”,反击则主要是揭露陈西滢并不公允。在《并非闲话》一文中,鲁迅说:“清朝的县官坐堂,往往两边各责小板五百完案,‘偏袒’之嫌是没有了,可是终于不免为糊涂虫。假使一个人还有是非之心,倒不如直说的好;否则,虽然吞吞吐吐,明眼人也会看

① 1925年5月30日《现代评论》第1卷第25期。

出他暗中‘偏袒’那一方，所表白的不过是自己的阴险和卑劣。”^①在《我的“籍”和“系”》中，鲁迅主要说明两点：一是自己不怕流言，“如果流言说我正在钻营，我就得自己锁在房里了；如果流言说我想做皇帝，我就得连忙自称奴才了。……可惜我总不耐烦敬步后尘”。二是奉还所谓的“尊敬”，“我们的乏的古人想了几千年，得到一个制驭别人的巧法：可压服的将他压服，否则将他抬高。而抬高也就是一种压服的手段，常常微微示意说，你应该这样，倘不，我要将你摔下来了”，“我本来也无可尊敬；也不愿受人尊敬，免得不如人意的时候，又被人摔下来”。^②

考察最初的论战，矛盾的焦点主要在于：陈西滢指责鲁迅偏袒学生，暗示鲁迅“挑剔风潮”；鲁迅则指责陈西滢“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③。如果到此为止，或许矛盾还不至于激化。

可是，事情没有就此完结。几个月后，教育总长章士钊决定解散女子师范大学，在原址建立女子大学。冷静想来，这未尝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但的确并不高明。于是，问题又出现了：一部分学生和教师组成了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坚决反对解散女师大。而且，鲁迅被推举为维持会的成员。如果鲁迅仅仅是女师大的教员，问题也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但鲁迅是教育部的佥事，作为教育部官员，反对总长的决定，自然会有更多的麻烦。8月12日，章士钊呈请段祺瑞，于13日罢免了鲁迅的教育部佥事之职。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鲁迅于8月22日提起诉讼。

偏偏就在这时候，陈西滢在8月29日出版的《现代评论》上再次发表《闲话》，继续讨论女师大风潮，并为章士钊鸣不平。面对学生把章士钊称作“英日帝国主义走狗”的现象，他说：“英日帝国主义者也实在是瞎了眼，怎样会选中了章士钊做他们的走狗？你看他有了英国日本两大帝国做靠山，还险些弄不过二三十个‘毛丫头’。”^④显然，在陈西滢看来，章士钊并非英日帝国主义的走狗，也非强有力的压迫者。但是，此时的鲁迅正受到章氏的压迫，并且

① 《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7页。

② 《鲁迅全集》第3卷，第82~83页。

③ 《鲁迅全集》第3卷，第77页。

④ 1925年8月29日《现代评论》第2卷第38期。

因此而丢了饭碗,感觉自然大不相同。因此,更容易使他把陈西滢看作章士钊的帮凶,此后对陈西滢文章的挑剔就更加严厉。同时,陈西滢也不示弱,几乎是变着法儿刺激鲁迅。双方你来我往,互相讽刺、嘲弄和攻击。陈西滢的许多文章(如《多数与少数》、《参战》和《利害》等)主要观点与鲁迅并无矛盾,鲁迅也要找出漏洞对其进行攻击。陈西滢在《闲话(参战)》中描写了中国人的卑怯:两个美国士兵打了中国人,百余中国人追着喊打,却没有一个人真敢动手。其实,中国人的此类弱点是鲁迅经常揭露的。但是,面对陈西滢文章结尾的句子:“这样的中国人,呸!”鲁迅却立即写了《并非闲话(二)》(9月19日),针锋相对地告诉人们:陈西滢比那些卑怯的国人更加卑劣。陈西滢写《创作的动机与态度》,写《版权论》,本与论争无涉,鲁迅却在《并非闲话(三)》(11月22日)中紧紧揪住进行挖苦。至于中国人是否“重男轻女”,对女性的尊重是否意在某一个女性,陈西滢是否看到了鲁迅支持女师大学生的“底细”,虽然鲁迅表现敏感,但实在是些无聊的话题。同样,陈西滢是否杨荫榆的同乡,两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李四光究竟与杨荫榆见过几次面,每月从图书馆领取的工资到底是五百元还是二百五十元,等等,虽然在双方的文章中多次出现,却根本没有争辩的必要。

考察在女师大问题上鲁迅的态度,个人的情感因素不应被忽视:一,杨荫榆是取代许寿裳而做女师大校长的,所以鲁迅对她缺少好感。二,杨荫榆开除的六位学生中,第一个就是鲁迅喜欢的许广平。这些因素有可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作为活生生的生命个体,鲁迅不可能完全超越个人感情。但是,在思想文化的视野里,这不是最重要的。鲁迅与陈西滢冲突的焦点非常清楚:从反对校长开除六位学生,到抵抗撤消女师大,鲁迅都毫不含糊地支持学生,即使在被免职的日子里,也没有放弃维持会的工作,坚持与无助的学生站在一起。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鲁迅一贯的风格:他不会站在权势者一边,而是必然选择被伤害的弱者。而陈西滢恰恰相反,既维护校长,又维护章士钊。这很容易给人造成误解:陈西滢是权势者的走狗。但是,考察陈西滢一贯的表现,他并非投机钻营之人,更非向权势者献媚之辈。他与鲁迅的态度不同,主要在于他更看重秩序,希望公平,不赞同校长压迫学生,也不希望人们过于偏袒学生。在他看来,如果学生无论如何都对,校长无论如

何都错,那是不公平的。在五四运动之后形成的文化氛围中,一个人如果站在权势者一边说话,往往是很不光彩的。陈西滢不是不明白这一点,但仍然要表明这种态度,守护他所认定的公平和公正,维护他所看重的理性和秩序。就这一点而言,应该是可贵的。

虽然教育司长刘百昭带人强行占领了女师大,使女子大学在女师大原址上建了起来,但是,章士钊并没有能够使女师大消失,所以冲突也不可能结束。在维持会的维持之下,几十名学生在校外租房,教师照常上课,顽强地维持了下来。到了11月底,政局的动荡带来了机会,章士钊逃往天津,女师大学生终于复校,并且在复校之后立即取消了女子大学。这一切必然带来了新的问题:女子师大与女子大学,哪一方更具有合法性?

12月26日,陈西滢在《闲话》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女大和女师大的争,实在是不容易了解的。我们一向信了某种报纸的话,以为女师大的学生比女大的多。直到女大学生报告,才知道女大有三百五十人,女师大只有四十余人。可是,我们还是受了某种报纸的催眠,以为女大的学生大半是招来的新生,女师大的学生转入女大的少。今天看到女大学生第二次宣言,他们说女师大的旧学生不满二百人,却有一百八十人转入女大,让几位外界名流维持的‘不过二十人’。这是以前谁也不会知道的。谁也没有想到的。足见我们的报纸是怎样的可靠了。如此说来,女大和女师大之争,还是这一百八十人和二十人之争。就以女师大论女师大,究竟谁应该算主体呢;如说一百八十人已入他校便不能算女师大学生,那么我们试问,要是二百人中有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会怎样?要是二百人都入了女大便怎样?难道女师大校务维持会招了几个新生也去恢复吗?我们不免要奇怪那维持会维持的究竟是谁呢?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①

在陈西滢看来,既然女师大的绝大多数学生已经转入女大,自然女大是主体,如果合并,也应该是只有二十人的女大合入三百五十人的女大,而不应该是取消三百五十人的女大而恢复只有二十人的女师大。虽然最后一问显得有失大度,但从多数出发,的确为自己找到了“理”。鲁迅这回不再旁敲侧击,而是直接作答:“要

^① 1925年12月26日《现代评论》第3卷第55期。

是‘帝国主义者抢去了中国的大部分,只剩了一二省,我们便怎样?别的都归了强国了,少数的土地,还要维持么?!明亡以后,一点土地也没有了,却还有甯身海外,志在恢复的人。’^①鲁迅的反驳同样显示着思想的力度,但用以证明维持女师大的合理性,却并不容易令人信服。

如果仅仅是这样的争论,还不至于把问题弄得更复杂,也不至于把矛盾复杂化。然而,最不应该发生的事发生了:1926年1月30日,陈西滢发表了《致志摩》的信,指责鲁迅剽窃和抄袭:“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铭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同时,也许是有感于鲁迅在他与权势者关系上大做文章,陈西滢又说:“他那种一见官僚便回头欲呕的神情,活现在纸上。可是啊,可是他现任教育部的金事。据他自己的自传,他从民国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从没脱离过。所以袁世凯称帝,他在教育部,曹锟贿选,他在教育部,‘代表无耻的彭允彝’做总长,他也在教育部,甚而至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免了他的职后,他还大嚷金事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的‘区区’,怎么有人在那里钻谋补他的缺……这像‘青年叛徒的领袖’吗?其实一个人做官也不大要紧,做了官再装出这样的面孔来可叫人有些恶心了。”^②

至此,矛盾已经无法解决。徐志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急忙高喊:“带住!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让我们对着我们自己不十分上流的根性猛喝一声。假如我们觉得胳膊里有余力,身体里有余勇要求必泄时,让我们往升华的道上走,现在需要勇士的战场正多着哪,为国家,为人道,为真正的正义——别再死捧着显微镜,无限的放大你私人的意气!”他甚至宣布:“本刊此后再不登载对人攻击的文字。”^③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徐志摩的真

① 《鲁迅全集》第3卷,第174页。

② 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

③ 李四光、徐志摩:《结束闲话,结束废话》,1926年2月3日《晨报副刊》。

诚,但是,已经晚了。受到严重伤害的鲁迅表示:“我还不能带住。”^①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即使是胡适给双方写信试图调解,也已无济于事了。

考察这场论争,开始不过是面对女师大风潮的不同认识,然后是猜疑和误解,最后则是人格上的互相攻击,矛盾终于无法调和。

二

如果进一步考察,鲁迅与陈西滢的论争实在是一场令人遗憾的笔墨官司。对于中国现代文坛,对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它的消极作用都无法估量。因为它影响了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关系,影响了鲁迅与胡适这两位新文化运动主将之间的关系,直接导致了新文化阵营的进一步分裂。

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显然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他们曾集结于《现代评论》,也曾集结于《新月》,因此,在不同的时期,又以“现代评论派”或“新月派”为世人注目。鲁迅与这一派关系的恶化就是从与陈西滢的论争开始的。因为鲁迅对这一派中的陈西滢等不少人进行过各种讽刺、挖苦、嘲弄和批判,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历史叙述中,这一派常常被看作鲁迅的敌人。但是,只要认真考察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50年代之后的叙述以单纯的政治观点划线,往往把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看作“反动文人”,而把鲁迅看作伟大的革命家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旗手,于是他们之间的论争就成了敌对阵营之间的斗争。然而,只要超越狭隘的视角,以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更具根本性的文化冲突作为思考的参照,就不难发现,鲁迅与“正人君子”之间的矛盾其实并不那么严重。无论陈西滢还是梁实秋、徐志摩,直至他们的精神领袖胡适,他们大都更多地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熏陶,自觉地致力于旧文明的批判和新文明的创造,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力量。他们拒绝做旧的专制统治的帮凶,也拒绝为新的专制政治鸣锣开道,显示着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他们向往自由,追求民主,抨击当局,批判国民性,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努力倡导现代文明,坚持了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这

^① 《鲁迅全集》第3卷,第242页。

一切,使他们与鲁迅站在了同一文化立场,成为新文化阵营中的战友。即使他们之间存在一些分歧,也仍然是新文化阵营内部的分歧。关于这一点,即使考察论争留下的那些激烈的文字,也很容易发现一个事实:属于个人感情好恶和具体事件、具体问题上的不同见解居多,而精神立场、文化选择和价值观念的冲突较少。他们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力,价值观念、精神立场和文化目标大同小异。在鲁迅与之发生过论争的三大主要群体(“遗老遗少”、“流氓加才子”和“正人君子”)中,在精神结构和文化立场上,鲁迅与“正人君子”是最接近的。因此,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力,他们本来不应发展到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

然而,一场笔墨官司发生了,而且愈演愈烈,双方大动肝火,都以击中对方软肋为快意,尤其是陈西滢,把道听途说的“抄袭”之说不负责任地公开发表,对鲁迅造成了深深的伤害。人们常说“爱屋及乌”,而被深深伤害了的鲁迅则很有些“恨乌及屋”。因为对陈西滢、顾颉刚以及与伦战有涉的李四光、徐志摩等的厌恶,对这一派从此再也没有好感。这直接导致了新文化阵营的一次大分裂。

尤其是鲁迅与胡适这两位新文化运动主将之间的关系,从此日益疏远,直至不再往来,其消极后果是难以估量的。

鲁迅与胡适的交往始于1918年,从1918年到1924年,两人有过长期的密切交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们方向一致,关系密切,无论是批判旧文化,还是倡导新文学,都曾经有过默契的配合和紧密的呼应。白话文运动,文学革命,都是胡适首先发难,鲁迅紧紧跟上;而面对鲁迅的成就,胡适则立即给予肯定和赞美。两人常常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同一问题进行探讨,见解往往高度一致。比如,胡适写《贞操问题》、《再论贞操问题》,鲁迅作《我之节烈观》;胡适写《我的儿子》,鲁迅作《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配合都相当默契。

在文学革命开始时,胡适第一个尝试白话诗,作为孤独的先驱者,没有几个人追随。鲁迅与刘半农、沈尹默是最早的响应者。他在《新青年》连续发表了《梦》、《爱之神》、《桃花》等一系列新诗。对此,鲁迅说过:“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

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① 当中国第一本新诗集《尝试集》修订的时候，胡适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认真参与了修订。当胡适遭到学衡派与甲寅派的围攻时，是鲁迅挺身而出，撰写《估学衡》等文，给予回击。

胡适对鲁迅则一直评价甚高。鲁迅发表《狂人日记》以后，胡适便给予热烈的赞美与高度的评价，称誉鲁迅是“白话文学运动的健将”。在1922年所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他在回顾五四运动前后的小说创作情况时指出：“这一年多（1921年以后）的《小说月报》已成了一个提倡‘创作’的小说的重要机关，内中也曾有几篇很好的创作。但成绩最大的却是一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② 1922年8月11日，胡适在日记中还写道：“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赏鉴力与创作力。”^③

在学术研究方面，他们也是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并且有过密切的合作。胡适1919年就想做一部《中国小说史》，可惜没有时间做。事隔三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胡适对此报以热情的赞扬。几年之后，在《白话文学史》自序中仍然认为“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④。《中国小说史略》出书前后，鲁迅曾反复征求过胡适的意见。在写作《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的过程中，胡适也曾多次向鲁迅请教。他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从资料 and 信息的互相提供，到思想见解的相互切磋，记下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段美好情景。

这一切都发生在《新青年》因政治见解而发生分裂之后，对于新文化运动来说，这尤其值得珍惜。

在陈西滢与鲁迅发生激烈论战之时，胡适没有介入争论，而是致信鲁迅、周作人和陈西滢，试图居中调解。他说：“你们三位都是我很敬爱的朋友，所以我感觉你们三位这八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

① 《鲁迅全集》第7卷，第4页。

② 《胡适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42~343页。

③ 《胡适日记》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55页。

④ 《胡适全集》第1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10页。

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我深知你们三位都自信这回打的是一场正义之战；所以我不愿意追溯这战争的原因与历史，更不愿评论此事的是非曲直，我最惋惜的是，当日各本良心的争论之中，不免都夹杂着一点对于对方动机上的猜疑；由这一点动机上的猜疑，发生了不少笔锋上的情感；由这些笔锋上的情感，更引起了层层猜疑，层层误解；猜疑愈深，误解更甚。结果便是友谊上的破裂，而当日各本良心之主张就渐渐变成了对骂的笔战。”胡适说：“我们现在有许多事业要做，而国内就是这么几个可以做事的人，即使大家努力，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也还怕干不了万分之一，为什么要把力量消耗在相互猜疑和自相残害呢？”^①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希望不要“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他总是把鲁迅看作自己人，直至鲁迅去世之后，甚至鲁迅已经被神化之后，胡适仍然不把鲁迅当作对立面。作为并肩战斗过的新文化战友，胡适对鲁迅的这份坚定认识足以发人深省，其中深含的情义也令人思之动容。

但是，与陈西滢的笔墨官司发生之后，由于对陈西滢等人的反感，鲁迅与胡适越来越疏远。鲁迅所厌恶的人都是胡适的朋友，他们紧紧围绕在胡适周围。他们离胡适越近，鲁迅就离胡适越远。胡适的确无意结党，却很自然地成了思想文化界的领袖。鲁迅不喜欢攀附领袖，尤其不愿意与自己所厌恶的人并肩而立。在他们形成的群体面前，鲁迅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迫，因而也难以平和公允地面对他们。他们一个个成了学者、教授、名流，鲁迅甚至因此而反感“学者”、“教授”这些称谓。他们占据了大学和文化界，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厦门、广州，鲁迅最后定居于上海而不回北京，并且永远告别了教育界，这一切都与此不无关系。

1919年3月26日，蔡元培召集相关人员在汤尔和处讨论处理陈独秀事，最后决定撤消陈独秀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那个会议给陈独秀留足了面子，但结果还是把陈独秀赶出了北大，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16年后，胡适读到了汤尔和当时的日记，写信对汤尔和进行了严厉的指责：“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了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

^① 《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74~375页。

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论定。”^①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有理由指责陈西滢,正是他不负责任的攻击,把鲁迅推入更为孤独的境地,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作者李新宇,南开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胡适适书信集》(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67页。

以“传统”批判“时代”

——“谴责小说”作家群的文化性格考察^①

耿传明

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是以1901年“清末新政”开启之后小说创作的兴盛为标志的。这一时期大量出现的“新小说”主要可分为两类,即“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后来被命名为“谴责小说”),这两类小说的兴盛主要来自于两种动力的推动,一是政治动力,一是商业动力。一般来说政治动力对其的推动比较明显而直接,人们往往会直观地认为是梁启超倡导的“新主义”的“小说界革命”,造成了晚清小说的繁荣;但一般来说为政治精英人物所提倡和认同的“新小说”在晚清文坛上并未占有主导地位^②,晚清文坛上最为活跃最有创作实绩的还是被称为属于“谴责小说”范畴的一批职业文人作家的创作,他们之从事小说创作自然有受到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启发、影响的一面,但是他们并非是梁启超所期许的那种专心于以小说为工具来教化民众的启蒙“小说家”,相反他们多是开明的守旧者,他们的创作代表的是都市市民文化的兴起,他们写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商业动机的推动,或者说是一种商业动机和政治动机的合而为一。正是这些在动机和立场上似乎显得有些暧昧的作家在实际上推动着晚清小说走向繁荣,由此推动了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谴责小说”作家群是中国第一代靠写作为生、靠读者养活的小说家,要了解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中间阶层和普通市民的思想、情感心理状态,显然需要从他们的创作入手。而他们的创作自身的确也有着与晚清时代的政治写作不同的价值诉求和审美偏好,他们一方面呼唤维新变革,

① 本论文为天津市“十五”社科规划项目,编码为:TJ03—YW2005。

② 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在论及晚清文学时,根本没有提及晚清时的政治小说,重点论述的是谴责小说。